

廣東建設研究專刊之三
羅香林著

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

廣東建設研究委員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出版

MG
K203
5
(1)



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

民國卅六年二月九日在廣東建設研究委員會演講

羅香林

今天的學術源流，由本人主講「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一節。這問題牽涉很廣，本人對此，雖曾帶心多年，但所得資料還很少，現在只能就輪廓方面加以述說。各位多屬學術專家，深望多為指正！

一、引言

在未講到這問題的本身以前，先有必須說明的三事：其一、凡是偉大系統的學術思想，依人類情感的溝通，及水陸交通的關係，必自然而然的成爲世界性的發展，各由發生的區域傳到別一地方，而構成交流的狀態。水陸交通接觸的失端，必成爲交流的阻隔。由阻隔的關係，必發生新的作用，由新的作用，必擴大交流的影響。這其歷史上學術思想發展與流變的一種迷象，很明顯的。

學術文化的體系，古今中外，各有其偉大的所在。中國學術思想，自最初發展以至現在，這成爲偉大體系的傳統。此外印度的學術文化是另一體系；古代希臘羅馬，又是另一體系；阿拉伯也自爲一系，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學術文化，又是另爲一系。而中國的學術思想，源遠流長，高明醇厚，而且富，飽蓄浸淫滲透推擴的力量，所以很早就向國外各地傳播，傳到到其他體系的學術思想圈地裏去。而上述古代理度以至於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學術思想，也循着交通之道傳到中國學術思想的圈地裏來。

廣東是中外交通水陸接觸的失端，所以牠很早就成爲中外學術思想交流的總匯，各種偉大系統的學術思想傳到廣東以後，遂以交流思想的關係而發生新的作用，由新的作用，便發生新的影響。我們研究廣東的學術思想，以至於一般的文化形態，必須從這點觀察，然後纔能了解牠的性質和牠的價值。這是第一點。

其次，學術思想的傳播和發展與轉變，亦與民族的遷移，與交通孔道的轉移甚有關係。廣東與中原的交通有三個主要的路線：一山長安出漢中，沿漢水順流而下，過長江後，經洞庭湖，瀟湘水而至湖南西南部，或

轉入廣西桂林，沿湘江下至耒耜，順西江而至廣州；或由湖南南部轉入廣東連縣，由連水（即小北江）出北江而至廣州。這可說是以洞庭湖爲中心的交通孔道。二由河南洛陽南下，經汝水，展轉過江，沿鄱陽湖，湖濱江至贛南，度梅嶺，由南雄領水，至曲江，順北江而至廣州。這可說是以鄱陽湖爲中心的交通孔道。三由洛陽或開封南下，或循汴水淮水，或循隋地運河至潮汕；或由福建西南入廣東大埔，順韓江而至潮汕；或由潮汕而更至瓊崖。這可說是以太湖爲中心的交通孔道。廣東與中原交通，大概不外循此三大路線進行。今日廣東的民族，除極少數的僑民與黎人外，大部分都出這三條孔道，自中原遷徙而來的。他們自一屏成拱南下，可分四個時期來說：最初是秦始皇平定南越，中原的人民，多循第一個交通孔道，而分駐粵桂；及後至東漢末年，中原多故，人民復多南下避亂，大率也取道第一孔道。這是第一時期的遷移。及至晉朝，以五胡亂華，中原民族受戰事影響，更大批南下，秦雍流人，多從漢水湘水而遷入粵桂；南豫流人，多循汝水瓊水而遷入粵桂；青徐流人，多循淮水經浙江而遷入閩粵。這是第二時期的遷移。後來到了唐宋黃巢造反，中原民族，以及上述第二時期遷民的后裔，尤多屢遭避兵，而遷至粵桂與粵贛及粵閩等交壤地及瓊崖。這是五代至宋初的安置與漸化，遂形成廣東白話客語與潮語三種方言系統。這是第三時期的遷移。其後到了南宋末年，因元人的南下，更使中原人民北上遷移的後裔，亦多被迫南遷，尤其是度梅嶺沿漢水而下，與由福建西南沿汀江而至廣東的爲數更多。這是第四時期的遷移。因爲廣東民族是自中原遷徙而來的，所以他的學術思想，也多少受有遷移轉徙的影響，而且也與歷代各交通孔道的演變有關，也多少受有遷移轉徙的影響，故關於畧積與漸化的學問，較不易發覺，而於民族思想與文學和哲理，則特別爲根據；由於歷代各交通孔道重心的演變，使廣東各地學術風氣的消長，及其

代表的產生區域，亦隨時代演進而具有相對的特徵。這是第二點。

其次，學術思想的特徵，及其對內對外影響的所屆，亦異其地理環境的自然影響有相當關係。廣東的地理情況，誠如汪放能學東文海序所云：「粵東瀕大海，宅南隴，山禽水物，奇花異果，如織文翻翠瑁之屬，莫不雲交霧，發蓄榮。而民生於其間者，亦往往有觀奇偉偉之氣，騁靈胸次，發於文章。」唯其瀕大海，宅南隴，是以對海外的交通，最為便利，而接受外來的影響，與放射對外的影響，也最為敏銳。廣東在秦漢時代，其條閣合浦及番禺等地，既為對海外各國交通的口岸，自三國中葉，中國商船出海港口，由是歷歷南甯南北朝以至隋唐，六百年間，繼起並行，皆以廣州為出洋港口。唐宋以來，各國海船，尤雲集廣州，航線既多，交通尤廣；印度乘統與阿剌伯系統，和文藝復興後的歐洲系統，其學術思想，皆隨宗教或商業的東來，而自廣東登陸，給予廣東以極大的影響；而自廣東直接而接出海的學術思想，亦不期然而然的給予歐洲如法國德國等以極大的影響。我們研究廣東的學術思想，必須了解牠的來源所在與影響所屆，然後始能看出牠的功能，而預測牠將來的趨勢與成就。這是第三點。

由於上述三事的影響，廣東學術思想，一直至漢代始有光輝的表現；自漢以後，則愈演愈烈，愈進愈深。現為便利起見，分為四個時期來說：第一時期自兩漢說至南北朝，第二時期自隋唐說至宋元之交，第三時期自明代說至清光緒中葉，第四時期自光緒下半年說至現在。

二、廣東學術思想第一時期的發展

由兩漢至南北朝為廣東學術思想發展的第一時期。我們知道，各種學術文化的發展，多數在人才聚集的區域。秦和西漢兩朝均在西安，關中為當時都的外圍，人口比較稠密，故當時中國的學術思想都總源於西安，以至於關中各地。此時廣東與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為中心，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而下，至涇陽湖，涇湖水南至粵桂交界；以西安為中心，由此交通孔道，向辰東輻輳。秦漢時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國的文化，亦多自安南河內以及辰東的徐聞合浦與番禺等地的港口傳入，而扼西江要衝的蒼梧，遂成為中原學術文化與外來學術文化交流的重心。現在廣東的封川，就是漢代合梧拓治的故址，當時珠江三角洲雖然也有相當的學術表現，但可以代表當時廣東學術思想的，還是西江中部的幾個學者，不但是儒家

方面如此，就是佛家方面也是如此。舉例來說，如春秋左氏之學，廣東最先傳學的人就是廣信的陳元及其父陳欽。欽初從楚國賢師治春秋左氏學，漢初徵同時，以所學傳授王季，自名陳氏春秋。元少受父業，為之詁訓，與幼年，與桓譚、杜林、鄭興等並為學者所宗。元因主張立左傳為國學，與范升等相辯難，卒告成功。春秋左氏傳，雖出已久，但未經陳元的研究鼓吹，未必能立於學官。自是以後，左傳在學術上的地位，日以顯著。春秋的大義是尊王攘夷與戡夷之防。自左傳大行，而春秋之作用日著，於中國學術思想，影響很大。這是陳元的貢獻。西江流域研究左傳的風氣，到了三國時代，還是很大。有士愛者，亦封州人。他曾任交趾太守，一面做官，一面講學，於春秋左氏傳最有研究，會為注釋；中原學者，很推重他。陳國憲徵，管書信與尚書令荀爽，盛道士愛的學問，並他「既學問發博，又達於從政，……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又尚書靈通古今，大義詳備。開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參爭，欲倣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可見士愛的經學是但求長義，不拘於今古文門戶之爭的，這是廣東學風的重要先河，有相當的引導作用。

至於自印度傳入的則為牟融的佛學。牟融的籍貫，據史家的研究，也是封川。他著理惑論一篇，是中文區述佛學最早的一篇文章。他生于東漢晚年，此時中原多亂，中原學者多跑到蒼梧。牟融本來是研究儒家經學的，後來研究道家學說，晚年再學習佛說，當時的人都攻擊他，說他「背五經而向異道」，他不得已作理惑論一文來答辯。當時印度佛教，由水路沿中南半島經安南或廣州而傳於蒼梧郡屬，封川一帶，佛學相當發達；故牟融得以學習佛說。牟融以後，廣州佛教日漸發展。由東漢晚年歷三國南北朝，海上交通發達，印度佛教傳播益廣，四傳如建康等輩；浮海東來，初抵廣州，傳授經學。據歷來傳說，廣州西關的兩來初地，就是達摩到中國最先登陸的所在。這時南朝以金陵為重心，他遂由北江用江西至金陵，後登洛陽。廣東方面到了唐代遂有六祖慧能繼承佛法，更為發揚，影響更大。由此看來，廣東佛學的發展，也是很早。這都是廣東學術思想第一期發展的情形。也是廣東學術思想在兩漢至南北朝所由發源到起作用時所在。

三、廣東學術思想第二時期的發展

由隋唐至宋代為廣東學術思想發展的第二時期。此時中國以進為科學

時代，隋唐兩都，雖在西安，但以洛陽為東部，五代至北宋，更以開封為國都，中原文化的重心遂漸向東部轉進，以洛陽為學術文化重心的趨勢，也一天加強，那時河南與南方的交通，不是以鄧州漢水為中心，就是以淮河與太湖水系為中心。洞庭湖水系的交通，雖然還有相當的地位，但較前洩遜色多了。當時由中原南下的學術思潮皆藉鄧州與太湖二水系的路線，到了南宋國都遷至浙江的杭州，太湖水系也以經由浙西入廣東的水系，更形重要。因為各交通路線重要性的轉移，所以北由淮河一帶，自六朝末年，就漸漸取得了學術文化上的重要性，北宋以後，東江與韓江亦漸趨重要。這時的珠江下游，雖然在學術思想上也有相當的表現，但就整個的發展性來說，第二時期廣東學術思想，仍以北江為代表，與九齡的上代是由中原移居北江的，因為他們得風氣之先，故在學問文獻的研究上有很多的便利。他以學問、文章、風度、氣節、事功，完成他偉大的人格，明代丘濬則九齡不但是學甫第一流人物，而且是江南第一流人物，亦是唐代第一流人物。他說：

「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以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文宗。公為後四十年，浙士始有陸敦與，國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韓宋，……誠非宋比，可以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

張九齡於思想方面，雖沒有特殊的表現，然能以學問文章發為政治家的風度，以氣節事功為限東人士的典型，這於廣東後日學風的影響關係甚大。北江在唐代以文章與相業著稱的，還有連環的劉蕡，以古文辭著稱的，還有曲江劉蕡，劉蕡著其之稱後於「傳」，「文章與韓柳齊名」。在宋以學問文章氣節事功著稱的，則有曲江的余靖，他的古文辭與歐陽修，蔡襄諸人相埒，當時公卿大夫，尚稱餘靖交游記引，這稱得等撰述，不得公名，為不辜不可，四方即譽為餘靖相稱。他嘗「使契丹，解決契丹」又與狄青共平侬智高的叛反，他的氣節尤為當時學者所推服。這都是仿家學者方面的發展。若就唐代廣東佛家的哲學思想來說，則發展更大，影響更廣。而其更顯要的代表，莫如禪宗六祖慧能和他的弟子法海與二傳弟子大顛等。原來

自達摩和荷由印度徙水道來粵，遂造成廣東更深厚的佛學風氣，由南北朝至唐代，自印度徙來粵的和荷，自中原徙來粵的出海赴印度等地求法的和尚，也與日俱增。當時海上交通發達，廣東且有翻譯佛經經典的僧侶與學者。在此環境之下，廣東在佛教上遂發生一種新的作用，而產生六祖慧能。他是新興禪人，俗姓盧氏，雖不識文字，而慧根很厚，他發願要傳授佛法，遂先至曲江學習，旋至湖北黃梅，向禪宗五祖宏忍法師求法。他在那裡做做挑水砍柴的頭陀。五祖門徒甚盛，他年紀長了，要把教條傳給弟子，要弟子先各做一偈，以表白心得。大弟子神秀，道行既高，任教授師既久，是傑出的人物。他作偈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慧能看了以為不對，亦作一偈，顯慧根本無掃，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原來神秀的方法，是以有了問題開題來解決問題。他以為人心各有至高無上的境界，這就是佛性，任是任何人都具有的，人只要頓悟，便達到你的境界，即心即佛，所以頓悟是成佛法門。這是慧能的新看法。五祖以為很對，便於夜間將袈裟傳授給他。他回到廣東，先混跡獵人隊中，後來到光孝寺，講論法門，開始受戒。最後乃到曲江，勿使說法，語衆達一千餘人。他提倡所謂一切萬法不離自性的「心教」，自性本自清淨，自性本不生滅，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無搖動，自性能生萬法。從前的佛家，多以戒定慧為成佛的階梯，慧能則謂「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得之」。這可說是佛教上的革命學說，當時他的弟子曲江法海，曾記錄他說話的言論，稱為法寶壇經。因為在南方講法，所以稱為法寶壇，神秀的階級則稱禪宗北派，一時有南能北秀之稱。慧能的大弟子行思與懷讓和神會等，更努力弘法，大有風靡一世的概況。從此南派的門戶大開，不特佛教的其他宗派皆為所壓，就是佛家的階級亦為侵入，中唐以後遂有宗復辟言一派，表示佛理說的流行，這于中國學術思想的演進上，有很大的影響。六祖傳法，門徒都由北江經江西湖南而傳入中原，在廣東則以二傳弟子大顛和尚為最著名。慧能所創一切萬法不離自性的禪宗南派，其最大約影響尤在於促成覺家理學的產生與發展。原來覺家經學，自唐初流行語經正統以後，既有與化的狀態，而禪宗南派的解放思想，後與教等有針芥之投。李翱就是受這頓悟影響而發展他自己思想的人物，他在文章方面，是韓昌黎的弟子，

但在思想方面却與李鴻章等能因傳弟子推微的影響；他任期州刺史時，會與他儒儒學，他著復性書所說的說明之性，與蔡元培所說的心，大致相通。唐代反對佛教致述的僧侶，後來到了潮州，與大頭和尚講論學問，也頗傾心於外形體，耳目鼻的慧能心教，可見佛家宗派流入儒家範圍的境況了。李翱一派的思想，他的學說，經五代的阻滯，遂形成宋代理學。理學是儒家變質了的學問，範圍這性命之理，分析其作用，主嚴格物慾，即心即理，即物即理，這又是受李翱一派學說的影響，近之則受五代陳搏太極圖說一類思想的影响，而宋代則學初祖周敦頤，則更受佛家宗派和尚直接的影响。出關致周禮之親，程頤，由二程學之，楊時二傳弟子為朱熹，以重道學問，窮理中致致中旨，為一種學派。楊時弟子王，傳其學於陸九淵，以尊德性為主旨，是為象山學派。從此中國的學術思想遂為理學所支配。廣東理學家，在宋代以興寧羅孟郊，潮陽鄭文振、郭子從，增城程興之，東莞程傑、李用為著名。羅孟郊嘗從程時論道，以節洛道緒自任，合德性學問為一體，尤為他任大學博士的時候，能以名節激勸門人陳東，發動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以反對秦桧的對外屈和，影響士氣更大。文振、子從並簡事未效。程興之則以名節為道之蓋障，勉勵後學。程傑亦私淑程時，上溯濂洛，下開白沙一派。李用潛心周程之學，尤以氣節著稱。大體都受中原理學的影响。

不過，六祖一切不離自性的頓悟思想，自晨微影響而帶成理學後其再生的影響，還有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理學發展到明末，會給與歐洲法德等國學術思想轉變上以相當影響的事例。原來歐洲基督教耶蘇會士，明末會感向中國傳教，他們因為傳教的關係，不得不了解中國學術思想，以便加以融和而減少阻力，故對孔子孟子的學說，亦喜為研究介紹，而對於理學則加以排斥。他們一方面以中外存上交通的關係而介紹早期的儒家學說，一方面又說明理學的非是，但陳東不明何者為孔子之學，何者為後來演變而成的理學，結果一起的都接受去了。當時歐洲的法國，一方面受教皇的迫壓，一方面受專制君主的統制，學者思想進感苦悶，亟思尋求出路，因為看見中國理學的重現理念與合理的人性，便大喜悅，因之加強其唯理主義的運動。服爾德(F. A. DeVoltaire, 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等，孟德斯鳩，孟德斯鳩都受其影響，而反對去不合理的宗教統制，與專制君主。這種思想傳播迅速，終以形成法國的革命運動。理學得到德國，他們的學者，以為中國人所说的理，就是基督教所說的神，而理的涵義比神的神展，大哲學家額布尼茲(Leibniz) 最先以理論論接收理學，以為理學的理，就是天的自然法則，這神天的法則，就是這普理性的法則。接着有佛斯克(Fosco) 和奧爾夫(Wolff) 等，都受斯氏影響，努力提倡中國思想，結果遂發生觀念論的正統哲學。到了奧氏再傳弟子康德，答「純理性的批判」一書，掀起了德國的精神革命，影響於世界哲學者至鉅。但推原其始，都其受過中國理學影響的。而理學在國內國外的影響，則由於六祖「即心即佛」的頓悟思想。這可知廣東學術思想所具世界傳播性與開展性的強烈了。這是廣東學術思想第二時期的發展情形及其影響所積。

四、廣東學術思想第三時期的發展

由明朝系光緒中葉為廣東學術思想發展的第二時期，這時期廣東各地的學術雖然都有相當的進展，但同時勢的推擠，經濟的條件，以及人力的滯進，到底已進為以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性為最大。嶺學的系統，也是到這時期才完成的。而其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對中原傳入的學問，無論理學樸學以至於經學史學，經過嶺學的洗滌，均有一種新的轉變與作用。先看陳白沙和湛甘泉一派的理學。陳白沙名獻章，是新會江門人。他早年曾從江西的吳康齋受業，但同時私淑廣東宋代理學的程興之，以名節自勵，他的學問崇尚自然，歸於自得，獨開門戶，超然不凡。他主張從靜中發出端倪，直達人類至高無上的境界。他以虔為基本，以靜為門戶，以上下四方往來今古象紐綜合為一體，以日用常行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為體認之則，以外未嘗致力而應而不違為實得。他雖然說學，自然體認，所以能夠無內外大小精粗而皆一以貫之。大家都以為中國理學到了白沙然後達到了精的境界。而其期於應用不遺，與立名節為道之蓋障，尤為嶺學以讀書修身發覺學問全體大用的精神所在。一般人以為他不主張讀書，其實他是由博返約，並非不看重讀書的，所以他說：「吾道有宗旨，千秋朱紫陽」。可知他的思想不是從陳象山那裏出來的，還是從朱子那裏出來的。不過經過白沙的流化，既賦予一種新的內容，故能發生新的作用與影響了。白沙的弟子，大概都能秉承師說，而其最傑出的就是增城的湛甘泉。他主張體悟體念天理，天理無分內外，實在還是白沙的傳得。他和專講良知良能的王陽明齊名，本來相當，但宗旨不同。白沙學說之所以大行，實得力於甘泉的推廣為多。甘泉也主張讀書，讀書然後才能體認天理，而體認天理，還是在於全體大用，這正是嶺學的精髓所在。甘泉弟子甚多，在廣東最重要的為

南海蕭若，甘泉段後，管代主講席。其次則為稱譽于海濱伯元，專攻學王陽明的學說。不過明代廣東學者專治王陽明一派學說的也很少，最重要的為揭陽羅儒，南海方獻夫，及惠陽楊起元，於甘泉學派適居於對立地位。接着還有東莞陳建，客籍鄧通籍，以破陽明而編朱子晚年定論之說。此外有香山黃佐，番禺與小學古訓等書，猶追尊朱子，而於白沙陽明概有所不足。不過白沙本亦以朱子為宗，究之仍是嚴格相連。此外則有海南島的丘濬，瓊山人，以治大學著名。大學一書，自經二程子的表彰，至朱子為之章句，真經秀又為作附錄，丘氏為作衍義，要之亦是尊崇朱子的理學。他即「儒考之學，有體有用，體雖作乎一理，用於就於萬事。」而大學的全體大用則在於由修齊以達治平，衍義初即在於就治平方面補十二目。這可說是理學的致用說，亦是嶺學的精髓所在。原著作明，理學衰微，就是南國時社的前後五子，也多做兼治理學，皆以文章氣節學問與應用不遺相號召，故無無用之文，亦無無文之學。到了明末清初，碑學自嶺學陶冶出來的士子，便皆出而起兵抗清，陳子壯與黎遂球等，死事最烈，風大均、鄧錫、陳泰尹等，以詩歌發揮其民族思想與氣節，這都是嶺學的精神表現。嶺學的潮流，自清康熙以後，仍潛滋暗長，咸同以後，遂有南海的朱九江次琦，復為明白倡導，他可說是嶺學的後勁，他歷年在經學，以讀書修身二事教人，謂做人必須從這兩方面着手，才能進及健全的人格，而成其大用；讀書而不修身，則讀書為無用；修身而不讀書，則身從何而修；他說「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處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隨而應天下國家之用。」這便是讀書與修身的關係。讀書包括五種學問，即經史、掌故、性理、辭章。修身，實為「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槍掃放蕩」。這時全國的學風，已趨向考據之學，與桐城陽湖等派的古文之業，而做軍獨以詩書、修身、應天下國家之用的學說相標榜。此即嶺學之所以為嶺學。而其影響之不同，亦即在此。朱九江以後發揚嶺學精神，而在清代大江南正風行樸學的時候，有樸學大師錢坫元，於嘉慶末年出任兩廣經籍，他看見廣東學風，不在重考據，因創立學海堂，延授學長，以教授廣東學子。阮氏很看重陳建的學說，這是因為樸學家本來反對陽明學說的緣故。他提示學海堂的學風，雖謂「一或存經傳，亦疏於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詞於蒼雅；或析道理，守吐噬之正傳；或討史忠，求深

察之家法，而且短短泄音，熟精音韻；師法唐宋，各得詩法。」然其微旨所在，仍為經學名物訓詁的樸學。他在廣東校刊皇清經解千四百卷，就是清代經學考據成報的總匯。當時的學海堂一語最為廣東學術的重心，從那裡出來的學子，多數都卓然有所表現；不過同時受嶺學的陶冶，其成就與作用，亦不盡如中原的錢氏。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番禺陳澧，初名內，外為九卷，聲律通考十卷，不但方法嚴密，而且有很多的創見，尤其是初韻考，聲律通考，能發前人所未發。不過東塾不以門戶見解，尤甚不贊成樸學家他重考據而陳以漢晉不講經義大義的門戶見解，因著漢書通義為主，蓋「林於上無歸，下無學」的危弊，欲為「正人心，息邪說」，故不能不講學著書。自謂「著書亦何為，中有不得已，斷牆再門戶，大風將不止」。所作東塾讀書記十五卷，尤灑發義理考據為一燭，發明甚多。至於史學，他曾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八卷，水經注西南諸水考三卷，亦有相當的貢獻。但他研究學術的深意，尤在學問的全體大用，所以說「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學術明，然後人才政治有濟於天下」。又謂「聖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行」。漢儒之行，最重要的為孝弟與名節。可見東塾的學問，雖以考據之學為中原人士所景仰，而其實際則為樸學與嶺學的綜合。東塾門徒多英偉之士，其所以能發牛新的作用，也就在於此。

在清代道咸間，廣東學術思想，因受中西文化交流的關係，曾發生另一型態的作用，這就是太平天國運動的思想。上面我已說過，廣東本有一種很深厚的民族思想，這種思想得到清初，以天地會的影響，遂集中於反清復明的一點。但受滿清文字獄的壓抑，乃轉而潛伏在農村下層社會。廣東東北江的耕種人家，早受這種潛伏思想的影响。恰巧自乾隆以至道光二十年清清英鴉片戰爭失敗後，基督教傳傳東粵，其徒更趨向廣東傳教，儘管傳不其教，崇拜上帝，則人間可以太平，靈魂可登天國。太平與滿清君主專制使人民不安的情況，及天國與滿清君主專制使人民不安的社會，概念上適相對立。於是，由反清復明的思想，遂演進為藉宗教宣傳為民族革命，以建立太平天國的思想。太平天國創立的首領花羅洪秀全，其主旨與思想的基礎，就是這種子來的。秀全的上代，原籍嘉應州，即今梅縣，其十一世祖洪三，於康熙年間，遷居花縣，傳五世即為秀全，

歷代以辯論爲業。秀全早受天地會的影響，少時曾赴廣州應試，沒有考上，憤恨不平；於廣州遇耶穌教的傳教士，大受感動，並獲發教士高學發發給的勸世良言，於拜上帝一點，有針芥之投，中經租種進，遂與擲人馮少山等創立拜上帝會，同赴廣西桂平等地傳教，招集徒衆爲太平軍，終以廣西打出了長江流域，建立太平天國。兵力所及，幾達全國三分之二。各省人民大爲響應，皆爲兩廣人士，其建國思想當以洪秀全及洪仁拜等的思想爲代表。秀全起義前所作原道教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及百正歌等，皆以耶穌教義與儒家義理相融合，學術上的評價雖然不大，但到底是一種開創，從思潮衝擊而推演上說，則有很大意義；其所以能發生一種新的作用，也就在此。至於由秀全與太平天國諸將綜合制定的天朝田賦制度一書，則於經濟思想上有很大的貢獻，他們提倡土地公有，由國家分配，以公莊耕種，無論生產與消費，均由法律規定，人民絕對平等合一，雖當時未必即會實行，然與後日「耕者有其田」的思想，甚有開先河的關係。至於其他男女平等的思想，女子參政的主張，也有很大的影響。

清代大江南北的學術，除了考據之學和古文辭之義外，還有對舊史給補表初志補注以及纂修方面的學問，與經學今文家復活的學說；道咸以後，因鑒於逆事的緊急，復有所謂西北史地以至於蒙古史的究新風氣。這些學風，也曾傳入廣東。尤其是光緒中葉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創辦雅書院，延聘山長朱一新等，教授兩廣學子。院規雖以經史性理詞章四科課士，然以時勢的激盪，於史學方面，特爲注重。當時曾延魏武進唐君、江陰經義等校刊歐雅叢書，所刊史部著作，佔全書三分之二，最著者本人即爲研究歐古史的專家。但廣東對於當時今文家的經學與一故的史學，經過地方的陶冶後，仍是發生了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南海康有爲與澳門人新會梁啟超。康氏治今文家經學，攻擊漢代的古文家，更進而謂孔子會否古改制，以爲其主張維新主義法維新的根本，引起了光緒二十四年先後百日的新政運動，影響也不算小。梁先生雖是康氏弟子，但其學術上的貢獻，仍在於介紹西洋學術與推廣史學，不過他推廣史學，手段方面，是把中外歷史人物，爲他重新作傳，而賦予時代意義，目的仍在於造成其辦法維新以至於其他主張的依據，究之還是帶有發學發揮全體大用的意味在內。其所以能與其所介紹的西洋學問同居爲大觀，在國內發生鉅大影響，

關鍵也就在此。要之自明初至光緒中葉爲發學盛行時期，無論白沙甘泉一派的理學，東塾一派普通漢理考據而自爲開創的粵學樂學之學，以至太平天國首領溫花耶穌教義與儒家義理而爲民族革命文化革命的思潮，以及康梁一派的學說，均會于中國學術界以極大的影響。這是廣東學術思想第三時期的倫系及其影響的所屬。

五、廣東學術思想第四時期的發展

由光緒末葉以至現在，爲廣東學術思想發展的第四時期，也是到了最大發展的一個時期；而其最重要的開創，就是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開展，以及國民革命學說與主義的開展與應用科學的開展。以國民革命學說與主義的開展與應用科學的開展，當明朝末年，基督教耶穌會教士把西方宗教傳至廣東，由澳門登陸，並以科學爲傳教工具，尤以利瑪竇(Matthaeo Ricci) 謝明堅(M. Ricci) 畢芳濟(F. Amore) 諸人，因爲欲在廣東居住，首以西洋科學儀器，及工藝品與藝術品，帶來廣東陳列，或贈與地方官吏，因此引起當時地方官吏鑑賞和研究的興趣。利氏在肇慶居住頗久，一方傳授科學，一方研究中國學問。當時澳門與肇慶皆爲廣東傳授西洋科學的總樞，舉凡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物理學、醫學、礦術、與建築術等，俱展轉傳授。利氏於萬曆十七年離粵赴京，曾寄居南京，至順曆二十九年到達北京，而西洋的科學遂陸續傳入廣東而普及於各地。這是廣東於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傳授的淵源所在。後來因爲康熙時清採取嚴厲漢人道器的政策，藉以維繫中國禮教而放鬆西來教徒，從而並壓抑由教徒所傳來的科學，因此致中國的科學研究受了很大的阻礙。不過廣東因爲地理的便利，科學的根源並沒有斷絕，兼以多旅海外的僑胞，亦漸漸於中西文化的傳播，具有媒介的作用，所以對於西洋科學的趨勢本來較之國內爲清楚。近代中國學界赴歐美國學的風氣，也先自廣東開發，很早就留學英國的容闈，與留學英國的何啟，就是倡導留學風氣的代表。而最早研究西洋工程之學的詹天佑，也是留學廣東南海。他首以自己的匠心發明新的方法，以新的技術，打破建築京張鐵路的困難，而終於得到成功。這正說明廣東學術界科學研究的淵源深遠，所以一旦機會成熟，便能發生新的開創，與新的作用。自光緒末葉以至現在，廣東的學術思想，所以能有更大發達的，就是因爲他已有現代科學上的創發，而且能以科學思想的進展與革命的主張相配合，構成了偉大的科學與學

說。而這位偉大的主義與學說的創發者，就是全國推尊的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這時期，不但廣東的學術思想界為 國父的主義與學說所領導，而須盡其最大的努力，就是全國的學術思想也為 國父的主義與學說所領導。而進入現代化學和革命化的新的局面，就是世界思潮也將由 國父的主義與學說的發揚，而發生一種新的作用與傳統的開張。

國父以天縱之才，幼年在東莞，對於中國傳統之學，既為相當的研習，十三歲後，又赴嶺南山學習英文，自詠美國民主思想向嶺南山推進，回國後，初在香港仁善醫院習英文，旋就學於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醫校，於陳外治治國學。到了光緒二十三年，香港倫敦教會徒何啟等，創辦香港西醫書院，他們以為要救中國，先要提倡科學，並請以醫學改造的主旨與自己的主張有些相符，遂於是年前往輔學。那時東方尚鮮能教授科學與西醫的人才。西醫書院的教授均為自倫敦延至，或為在香港服務的西人與少數的華人，且直接用英文講授。 國父對於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化學、植物學、解剖學、生理學等，皆研究有得，對於醫術亦造詣甚深，且復於陳外研究地理、農學及國學。那時正值英國達爾文死後不久，其進化論學說風靡歐洲，而法國大革命史的研究，亦為當時英法史學界的趨勢。這些實賴隨地合探討，以欲改造國人的心理，後來遂發明難行易的學說。由於各種科學的化論的思慮，遂發現達爾文的物種天擇適者生存的學說，一部分很對，一部分却須修改。他以為進化的歷程或事實，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物質的進化以達成地殼等物體為原則，物種的進化以競爭為原則，人類的進化則以互助為原則，而不應以競爭為原則。因為要修正達爾文的學說，總以要建立革命學說的純理基礎，接造就演進為新進化的體系，說明知行關係，及互助的事實與演進，都是進化的所致。 國父對於人類的進化，分三方面立說，由不知而行，以至行而後知，與知而後行，是為知行關係的演進，也就是人類所以異於一般物種，而所以能以互助為進化原則的由來，這是第一方面。由人類與獸爭的氣力時代，進為人類與天爭的神權時代，再進為人類與人的君權時代，更進為善人與惡人爭的民權時代，是為互助組合的演進，也就是國家社會以至於世界各種制度與典章的由來，這是第二方面。而古今人類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所以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這是第三方面。新進化論的體系就是分析進化的事實，發明所以進化的原則，而指示人類前途的開張，這與知難行易的學說同是科學上的創發，是放諸發揚光大的。

國父很看重科學，而且非常偉大的創發，但他對於科學的發展是以人類的互助為前提，而須與中國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者互為條件的。他很看重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的三綱，很看重仁心仁勇三達德，他要把中國這些品德從根拔起，而同時要把西洋科學迎頭趕上；蓋沒有科學的發明與應用，則道德無力以養民衛民，沒有道德的實踐與持世，則科學亦無由保障人類的幸福，故二者須互為條件，相提並進。道德的能養與科學的研究，必須互為加強，互為大用，然後人的境界才能日漸提高，人的生存，才能永遠保障。歐洲人士並不是不講道德，但不以之為科學研究的條件，所以科學的發明，常為野心家用以屠殺人類。為保障世界的和平，必須加強科學研究與明德探持之互為條件的關係。 國父道德與科學相提並進的遺教，不但為今日中國學術教育界的指針，而且也是全世界學術教育應有的指針，中國學術界人士必須把袖發揚光大的。

國父所創立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是總合古今中外學術治化的精華而自為創發的主義，也是由中外學術思想交流而起的新作用，經 國父的開發而更為明期的例證。三民主義這本稿，雖是民國十二年 國父在廣東大學長期演說後略記錄完成的，但牠的輪廓， 國父早已建立，民族主義的思想和主張， 國父創學之早，不用說了，就是民生主義的思想和主張，也是概基於 國父早年的研究醫學；民權主義的思想和主張，則在 國父自檀香山回國後，已有基礎了。 國父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時，即光緒二十三年至十八年，已提倡科學與民主的運動，不但提倡，而且一面研究科學，一面策劃民族民權民生的革命。民國六年，有些學者提倡新文化運動，以科學與民主為鵠的，不知前此二十多年前， 國父已在倡導思想了。 國父之所以為先知先覺的革命導師，也就在此。 國父學術思想之所以能有更新更大的作用也是在此。康梁雖然提倡變法維新，但對於西洋科學沒直接的研究，不過根據傳譯或轉載的本子說說罷了。而 國父則於科學與國學，皆為貫研精思，而且有新的創發，所謂「生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此， 國父之所以能領導革命運動，號召全國志士，以推倒清室專制

政府，而建立民國，可能以主義和學說感召繼承尊的最高領袖，由打倒軍閥以至於抗日，以至於抗日建國的成功也。國父是中華民國的國父，他的學術思想當然不能以廣東為限。不過廣東為國父的故鄉，廣東現代的學者對國父的親炙與體會者很多，於國父的主義學說，及其在科學上的創發，和科學與明德須互為條件的主張，當然有爭揚光大的責任。國父的主張，而廣東追隨國父從革命與偉績，國父主義和學說的先進與時賢，也很不少，他們對於廣東第四時期學術思想，也曾有很大的貢獻。上述各期國父的訓誨，曾追隨國父從革命及講學的先進與時賢，因認為大家所熟悉，所以現在不再詳述。總之，第四時期廣東學術思想的發揚是有其更大與更新的作用的。

六、結論

廣東在秦始皇平定南粵以前，住的人民多屬百越民族的系統，南越雖有相當的文化，但沒有發展到運用文字以表現學術思想的階段。中原民族自秦始皇平定南越以後，始部分的逐漸遷移入粵。所以在遠古以至夏商周三代，中原學術思想已植下了很深厚的基礎，而廣東這地方，根據現有的資料來說，還沒有什麼學術的表現。在春秋戰國，中原的學術思想已光

華璀璨了，而廣東這地方，也還是默默無聞。因為廣東的學術思想發展較遲，所以過去常為議論中國學術思想史的人們所忽畧，其實一加分析，則知雖然發展較遲，而開創性與影響性則仍甚大。

兩漢以後，廣東的學術思想，所以能有很大的開創與影響，一方則基於民族本身之優秀與努力，一方植基於中外學術文化交流之經過與激揚。有了優秀與努力的民族，又有因地理條件的優越而引起的中外學術文化交流的經過與激揚，他自然能依時代的演進而不斷的發生新的作用，與新的開創。由新的作用，遂發生新的影響；由新的開創，遂構成廣東學術思想的特質。這種新的開創與新的作用，其影響多循交通要道，向廣東以外的各地放射。因此翻閱，所以廣東的學術思想，以其自廣東本身來看，往往反不如自整個中國學術文化史來看，或自整個世界學術文化史來看，來得明白。這是基於上面的議論而可約略知道的。

不過廣東地理，一方給予廣東學術思想界以優越的條件，一方也給予廣東學術思想界以不少的困難，氣候上濕熱時間較長，使學術研究者較易疲倦，而文物資料亦較難保護，這是一種困難。出入海口上有一部分為外人所經營，不能與今日中國學術研究的政策相適應，這是另一種困難。必如何克服困難？則非這次演講主題的範圍，留待別處再說。今天所說，實在粵之無甚高論，仍請各位不吝指教！

